

文集



中日文学交流之溯源与阐释

王晓平教授古稀纪念文集

孙立春 勾艳军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中日文学交流之溯源与阐释

——王晓平教授古稀纪念文集

孙立春 勾艳军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学交流之溯源与阐释：王晓平教授古稀纪念文集 / 孙立春，勾艳军主编.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78-1703-1

I. ①中… II. ①孙… ②勾… III. ①文学—文化交流—中国、日本—文集 IV. ①I206—53②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982 号

中日文学交流之溯源与阐释

——王晓平教授古稀纪念文集

孙立春 勾艳军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英 罗丁瑞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6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703-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中国风骨·国际境界:王晓平先生学术思想综述

——为纪念王先生七十寿辰而作

勾艳军

王晓平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长期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汉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及中日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具体如日本藏汉籍古写本的文献学研究、日本诗经学史、日本汉文学对中国汉学的受容与变异、敦煌文学文本及敦煌俗字与日本藏古写本的比较研究,以及日本中国学史研究等。王先生多年坚持“跨文化新朴学”的探索,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朴学方法,对汉字文化圈的汉语言文学展开了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

王晓平教授扎根于考证朴学,实事求是、力避空疏的“中国风骨”,融会贯通、跨越文化的“国际境界”,这既彰显出其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也为国内的中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树立了典范,在扩大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王先生还积极致力于将学术由书斋和象牙塔推广至大众。“孤诣独往,而不孤芳自赏;学归大众,决不哗众取宠”^①,这正是先生学术抱负和学术基准的真实写照。

王晓平教授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很多选题都颇具开创性和奠基意义。代表专著有《日本诗经学史》《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佛典·志怪·物语》《亚洲汉文学》《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和《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学》《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日本中国学述闻》《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等;合著有《中国文学在日本》《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等;译著有《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等;主编图书有大型学术丛书《人文日本新书》《日本中国学文萃》等。此外,王先生还在中日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百余篇,并多次获奖。

^① 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4页。

王晓平教授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如“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百年中外学术交流史”“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其中,《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这一研究成果被收入 2013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王先生还曾主持“环太平洋地区文化与文学交流”“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东亚比较文化”等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推动东亚地区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晓平教授曾多次赴日访学,先后担任日本福冈大学和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文部省直属机关日本国际日本文化中心客座副教授,曾任教于日本立命馆大学、茨城基督教大学、帝塚山学院大学,并在京都、秋田等地讲学。王先生在访学期间,同日本学界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与交流,并与中西进、川本皓嗣、加藤周一、梅原猛、松浦友久等著名学者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王教授曾与日本“中西万叶学”的缔造者、“文化功劳者”获得者中西进先生就中日古代诗歌展开对谈,后整理成书《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堪称中日比较文学界坦诚交流、互相激发的一次极佳的尝试。1995 至 1996 年,王教授师从原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川本皓嗣先生,深切感受到不同民族间“文化互读”的重要意义,两位学者的对谈《“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寄寓着通过文学交流来加深文化理解的美好希冀。王晓平教授在多年的赴日访学与执教生涯中,积极致力于向日本学者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髓,同时以对等的姿态认真倾听对方的声音,并多次召集和参与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及学术交流活动,表现出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卓越的沟通、组织能力,在促进中日比较文学界的交流与理解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晓平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东亚比较文化会议中国分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王先生的研究著述及论文多次获奖。1986 年,《论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1988 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训释方法》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1993 年,专著《佛典·志怪·物语》获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 年,王晓平教授被评为天津市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归国人员,1999 年被评为教育部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王教授自 1994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 年,因在《万叶集》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荣膺日本第二届“奈良万叶世界奖”。

王晓平教授在天津师范大学执教 40 余年,在中日比较文学的知识传播和接班人的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老师年近七旬依然笔耕不辍的勤奋精神,激励

着弟子们勇往直前、不懈努力;面对种种人生磨难时不言放弃的坚强与乐观,使弟子们有勇气直面生活中的困难。遭遇学术瓶颈时,老师的悉心教导与精准点拨总能令大家茅塞顿开,论文上的满纸朱批更成为学生品味一生的宝贵财富。王老师曾以司马迁文庙的一副楹联来鞭策众弟子:“读五车书博古通今真学问,行万里路经天纬地大文章。”的确,做真学问、写大文章,这也正是我们每个研究者在求索道路上须时刻谨记的座右铭。

总体来讲,王晓平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三大体系——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汉文学研究、日本藏汉籍古写本的文献学研究。王先生多年来提倡的“跨文化的新朴学”理念,也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在我国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一门“显学”,1987年,在乐黛云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下,王晓平先生完成了“比较文学丛书”中《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的写作,正式踏上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探索之路。由近代到现代,进而追溯到古代时期,王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日本》《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等学术专著,为我国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的贡献。

以下,笔者主要以三部著作为主线,来回顾王晓平先生在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探索之路。

(一)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拓荒之作

1987年,王晓平先生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正式出版,该书与严绍盪先生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同为“比较文学丛书”系列,被誉为“珠联璧合的姊妹篇”,并成为探讨东亚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拓荒性著作。那时,国门尚未全开,资料极为匮乏,王老师每天埋头于天津图书馆社科部日文阅览室,阅读日本图书馆馆藏的旧日文书刊,透过那些半个世纪尘封土掩、散发着淡淡霉味的日文书籍,发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充满生机的汉文世界。

王先生在引言中首先强调了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意义,并指出其任重而道远:“文学交流是一门学问。研究文学的翻译、介绍、借鉴、影响,是促进国际文学交流所应当完成的不容置疑的任务。然而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此,它有助于提高外国文学介绍和翻译的质量,有助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汇通,有助于校我之短长而自淬砺,有助于在更广阔、更高远的背景下对文学的发展

做宏观的观察。这样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①

日本近代文学多从明治维新算起,为避免论述成为无根之水,王先生首先从“袁宏道和山本北山的清新诗论”“明清小说和日本前近代小说”等五个章节入手,围绕江戸末期的汉诗文及“戏作”做出了铺垫性介绍。接下来,王先生着重从汉诗与小说两大领域回溯了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例如,在“日本维新志士与中国文学”“明治汉诗和中国文学”等章节中,王先生通过日本维新志士对苏轼、杜甫、陶渊明等诗人诗作的摄取得出结论:“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幕府末年文学的影响,并不只是表现在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上。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学著述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捍卫民族尊严的情感和对现实矛盾的思考,必然感染处于相类似历史条件的读者。”^②在小说领域,王先生按时间顺序描述了不同阶段小说的发展特点,如明治初期的翻译小说辞赋化倾向强、政治改良色彩较为浓郁,这一时期的小说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这一口号产生重要启示。除了对文学史中重大的、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加以透彻的分析外,王先生还具体描述了一些重要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和改编情况,如森鸥外的《舞女》对《杜十娘》的吸收、幸田露伴的《露团团》对《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借鉴等,不仅揭示出其影响关系,而且对其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学、文化学剖析,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均对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因其开拓性、理论意义和文献学价值,受到比较文学研究界的高度评价,例如,克冰先生在《文学遗产》中谈道:“在庞杂、繁复的历史现象面前,《史稿》著者紧紧抓住各阶段有代表性的重要‘交流’史实,从诗、文、小说、戏剧几大阵地的具体作品、创作理论、流派斗争等方面入手,理枝顺蔓,举纲振目,溯源探流,明晰地描绘出近百年内中日文学交流、影响的历史图像,读来通达顺畅,绝无绞缠累赘之感。作为拓荒之作,第一斧即辟出这样顺达之径,实为难能。”鲍国华在《跨文化的新朴学——王晓平教授学述》中也高度评价道:“该书以影响研究为基础,借助严谨细密的文献爬梳,清晰地描述了近代中日文学双向互动的线索、途径与方法,在对影响的考辨中不乏深刻的理论分析,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被专家誉为比较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的范例。”

(二)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文化互读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论述的历史阶段主要是近代,作为延续,王晓平先生于2002年出版了《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聚焦于现代,这部著作也被视作《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的“姊妹篇”。

^①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② 同上,第94页。

王晓平先生一直在倡导不同文化间的坦诚对话,希望文学能成为沟通异质文化的桥梁。纵然“梅红樱粉”,但“中日文化悠久的交流历史,却并不都是这样充满诗情画意,文化上的隔膜、误解和冲突,使得‘一衣带水’的邻人,竟然常常相互感到对方是‘其室则迩,其人则远’。”^①在著作前言部分,附有王晓平先生与川本皓嗣先生的对谈,题目为《“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两位学者希望通过对话来充分倾听对方的声音,以求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

《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梅红樱粉》)选取了日本近现代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加以分析。例如,《三教余露》一篇考察了幸田露伴、森鸥外、夏目漱石对中国小说与汉诗的引用及对儒释道精神的共鸣,《求索之魂》一篇考察了日本学者对鲁迅中国文化观的解读及其文化根源,此外,《中岛敦选择的眼睛》《谷崎润一郎美的变奏》等篇目,揭示了日本作家对中国元素特殊的选择视角,《武田泰淳的中国人感觉》等篇目,考察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学”观,《中野美代子和她的思索“悦乐之园”》等篇目,则分析了日本学者如何通过《西游记》等小说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世界。

《梅红樱粉》敏感地捕捉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转型对文学的直接影响。例如,在脱亚入欧、全面引进西方文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下,幸田露伴、谷崎润一郎等作家的历史小说注入了现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的行为准则实际上不再是忠孝节义,而是正义、进步等人道主义,并且流露出日本式的浓浓的感伤情调。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也是《梅红樱粉》着重探讨的问题,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深感敬意,一方面又不时流露出对现实中国及中国人的失望或轻视。的确,尽管仍有知识分子热爱汉文学并从中寻求寄托或者共鸣,但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微弱,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中岛敦等深受汉学熏陶的知识分子,在转头去学习西方时普遍产生了一种抗拒、失衡和撕裂感。“当《梅红樱粉》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客观并且也是非常必要地、准确地捕捉了日本文坛此时的一种现象,即在不可挽回的弃东奔西的大形势下,一部分从小接受汉文化熏染的作家如何痛苦地与汉文化割裂关系。”^②

在结尾处的《东望扶桑与“西望长安”》一篇中,王教授提到了中日之间尤其是现代存在的文化隔膜问题,同时借用萧公权的一句话,提醒我们不能看轻日本文化而忘记了自策自励:“看轻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就是隔膜。日本地理与历史形成

^①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页。

^② 蔡春华:《对谈·被撕裂的痛苦·异国形象——从〈梅红樱粉〉谈起》,《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106页。

的沉重的文化危机感,使得许多日本作家在看待‘西土’(古时指中国)时常有一只追慕的热眼与一只警戒的冷眼,这一热一冷使他们朝夕奋发,精进不息。可惜,许多中国作家多看到这只热眼,对多彩的日本文化却报以冷漠的目光。同样,日本作家普遍存在的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漠视与闭耳塞听,隔膜也是原因之一。”^①

(三)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译介学”探索

2014年中华书局推出的《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是王晓平先生中日文学交流史的集大成之作,并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代表着当前相关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杨伟在《2012—2013年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中指出,《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强调文化的互读,注重原典实证而又有理论阐发,既有本土立场,又兼具国际视野,堪称集中日学者之长的典范之作”。

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能够世代共享的经典,而这些丰富的经典资源只有经过反复翻译、不断重读与创造性的开发,才会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文学经典的影响研究,无不有着极为复杂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背景,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更存在着复杂而丰富的文化纠葛和文学因缘。中日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的整体研究,就是采用文字学、语言学、翻译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经典在对方国家的传播和翻译做出描述。著作围绕诸多理论问题及典型个案,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回溯历史渊源,对准问题症结,分为三部分加以讨论:上编历时性地探讨中日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涉及的多种要素和各类文体,中编对中国文学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研究和接受择要论述,下编则关注日本文学经典在中国翻译中一度普遍存在的过度归化与文字学修养问题。

王晓平先生从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背景,去考察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综合考虑社会思潮、文化需求、时尚趣味、名人效应乃至传播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多重合力,并强调了近代以来教育体系、新闻出版及各种媒体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学经典通过人员、图书等传播方式,以汉字为工具,造就了日本的汉文学与汉文化体系。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经典,都会在他国享有同样崇高的声誉和受到同等推崇。文学经典作品在跨疆越土进入到‘他文化’之后,就开始了自身命运的独特旅程”^②。这时候,就需要聚焦于译者、阐释者、教育者、阅读者,全方位探讨文学经典在国外的命运。

“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王晓平先生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和解读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汉文直读期、文言训读期、白话口语期。著作通过

^① 王晓平:《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②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页。

大量实例,强调了“训读”在汉字教育和传播过程中的引渡、吸附、消纳作用。王教授还提出中日之间“字境”的概念,以便更为精准地描述文字政策、文字演进等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名著汉译的文字问题,论述了翻译者文字学修养的重要性。

翻译离不开对两种文化与语言的科学把握,王先生主张用“互读”的方法和立场去理解异文化,以此来扩大对经典的共识和传播,探讨翻译的历史及现实问题。之所以强调互读,首先是因为传播和翻译的对象与运作策略的选择,都牵涉两种文学在比较中显现的不同特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只有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两者的个性才能更为鲜明,“译者追求形神兼备的翻译效果,读者期盼读到具有异国情调而又‘不隔’的精品,传播者希冀达到最佳反响,而这一切都不是一种语言文字孤立作用的结果,但最终则与引‘外’引‘内’的文化更新相关,指向本国文化新的创造”^①。

像这样,王晓平教授在《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通过对中日文学经典传播与翻译的探讨,为从事日本文学经典翻译的学者提供了很多基础性的、很有价值的材料,也为从事中国文学经典日译工作的学者带来了很多域外接受的准确信息,堪称中日文学经典译介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探索与总结。

二、比较文学研究的亚洲视野:跨文化对话·汉文学聚焦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最需要的是平等对话。如果交流双方持有狭隘文化心理,沟通交流就很难有成效,以狭隘对狭隘只能深掘鸿沟。只有克服狭隘文化心理,对其他文化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交流才能见到成效……总之,只要坚持知同、明异、互读、共赏,就会使中外文化交流更加活跃,进而在更大范围找到中华文化的知音。^②

王晓平教授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未局限在中日的框架内,而是将视野延展到韩国、越南、古渤海国、古琉球国,进而追溯到印度等东南亚地区。这一研究视阈的扩展本身亦堪称“国际视野”。此时,传统的“东亚”“东方”等概念显然已无法囊括这一文学交流的含义,因此,王晓平教授酝酿提出了“亚洲汉文学”的概念。其实,早

^①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页。

^② 王晓平:《文化交流“殊声而合响”》,《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1日。

期的《佛典·志怪·物语》就是一次积极的尝试,2009年出版的专著《亚洲汉文学》,更是集中体现出王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纷繁史料卓越的驾驭能力。

(一) 多国间文学影响关系的追溯与把握

《佛典·志怪·物语》打破了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将视野扩展到印度、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学交流大潮中。古代日本人曾有一种观念,即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便意味着整个世界,《佛典·志怪·物语》采取的正是这一意义上的“国际视野”。正如王向远先生在《近20年来我国的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述评》中所言:“在这三点一线上展开研究,表现出相当大的选题智慧。”

著作以中国志怪小说为中心,一方面从“主题学”的角度,对沿袭、模仿和翻改佛典中印度故事的情况做了细致考证,以探讨中国文学家在叙事文学方面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轨迹和特点。另一方面,从“翻译学”的角度,确立汉译佛典特别是志怪小说对日本物语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日本佛教文学的研究还处于空白期,从佛典—志怪—物语这一突破国别局限的视角,来剖析三国的小说史乃至文化交流史,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王晓平先生在《佛典·志怪·物语》中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和见微知著的目力。他指出,印度、中国、日本长达数百年的文学因缘,与中古时期宗教的兴起和传播密不可分,佛家堪称古代世界性文学交流的“驿骑”。中国有儒释道的融合,日本历史上也并非“直餐梵响”,而是通过已经“译梵为秦”的汉译佛典来接受佛教,并且,此时的佛教已然是一个掺杂了儒道等思想的混合物。佛教故事和中国志怪小说大量的翻译仿作及与佛教有关的物语相继问世,终于形成了印度、中国、日本宗教文学大汇流的局面。

透过影响与传播的表象,王先生洞察到中古时代对于艺术的理解和评价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细微变形或取舍的深入思考,发掘出很多各国文学独特的思想内涵或文学传统,并得出结论:“神话与历史在印度、中国、日本文学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正是三国古代文学最有代表性、最鲜明的差异之一。在中印之间,这正是中国文学能够利用印度文学以充实自己的条件,又是现实性思维发达的文士对其采取某种抵抗态度的理由……印度式的幻想,对中国志怪小说中的鬼神世界、神仙世界、精灵世界、幽灵世界、龙宫天堂世界幻想的立体构筑,具有催化与赋形的功用,而迫于经史叙事文学的重压,志怪小说又很晚才去模仿佛教故事放慢叙述进度、类聚平列结构,以及多用直接语气等平民式的叙述方式。与此不同的是,后起直追的日本文学表现出了兼容性与活泼性,在对中国文学抱有崇敬、崇拜心理,积极采纳中国志怪小说的新观念和新主题的同时,表现出对幻沓境界的极大热忱,什

么狐淫蛇乱,什么仙来神往,什么易卜相术,稍一变样,据为己有,一部《古事记》更是充满夸诞的神话。纵观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佛教的影响在儒教之上。”^①

“主题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切入点,王先生致力于对神话的主题或母题做追根溯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民族与时代的作家如何借助同一母题来抒发情愫进行了深入辨析。例如,从比较民俗学看弃老、蛇婚、乱宫母题的传播与演变,考察印、中、日三国龟报故事的同与异,分析干将莫邪故事在日本的影响和变形等,都为我们鲜明地揭示出印度、中国、日本三国的历史及文化特色。可以说,《佛典·志怪·物语》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鞭辟入里的分析,旁征博引,溯本求源,让我们重新领略到中古时期浩浩汤汤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大潮。

《亚洲汉文学》是王晓平先生的又一部力作,不仅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而且聚焦于“汉文学”。著作以专论集锦辅之以概论的体例,做到了总体把握与个案研究兼顾。首先,王晓平先生在“书缘与学缘”中,描述了中国文学典籍在韩国、越南、古渤海国、古琉球国的流布情况,之后通过“歌诗之桥”“迎接儒风西来”“梵钟远响”“神鬼艺术世界”“传四海之奇”“走向宋明文学的踏歌”“辞赋述略”等章节,详尽考察了汉文学对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域外汉文学因变形或创造而形成的新特点。

亚洲汉文学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名篇佳作,但我国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大多对域外汉文学语焉不详,迄今各国的汉文学研究,也多以国别为限,对于日本、韩国、越南乃至古代的渤海国、琉球国等地区的汉文学,尚无统一的名称。王晓平教授“亚洲汉文学”概念的提出,“既是为了强调研究的整体性与开放性,也是为了通过对域外汉文学文化内蕴的探讨,寻求有关汉文学兴衰及其与近代亚洲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答案”^②。

之所以聚焦“汉文学”,还在于古老的汉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被遮蔽或淡忘的历史符号。王先生谈到,18世纪后半期以来,亚洲各国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文化转型,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历史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一度不同程度地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精髓认知不足的偏差。亚洲汉文学在各国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比拟与无以替代的。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是有赖汉字记录下来的。那些汉字的写本和印本中,有各民族的浮沉盛衰,也有各民族的喜怒哀乐。总之,要想了解相邻民族的文化发展轨迹以及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就必须要认真解读那个时代的汉文典籍。

① 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② 王晓平:《亚洲汉文学的文化蕴含》(代序),选自《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王先生在自序中指出,汉文学的繁荣主要出自各民族自身的选择和蕴蓄,因此不适用于今天的“殖民文学”等概念,各国对中国文学的选择也具有很多共性,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安邦治国的使命感、道家随顺自然的生命观和宇宙想象、佛家的无常观和慈悲观等,成为汉文学相通的内容,而重诗文的文体价值观、重风格韵味的审美意识,以及多用典、讲声律的语言技巧等,都是可以相互欣赏,并很容易沟通和理解的”。从文体上来说,域外汉文学可以划分为“为政之文”“为教之文”“为礼之文”“为戏之文”,而以汉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为突破口,或许可以纠正拿西方文学观念来对汉文学削足适履而造成的某些偏差。同时,汉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们的“同”,更在于它们的“异”,因为很多汉文学血液里流淌的已经是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了,通过对比研究更能够凸显各民族文学的本质,并催生出对该地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王先生的《亚洲汉文学》已经成为亚洲文化互读的重要文本,正如徐艺玮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观照之下的汉文学研究——评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中所说的:“王晓平教授的《亚洲汉文学》一书,以国际视野打破民族、学科的壁垒,对中国及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汉文学进行了通盘考察和系统分析。作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突显出其整体观照的国际视野、独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这三大亮点。此书在中国比较文学和汉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二) 坦诚开放的文学对话与文化沟通

王晓平先生在以《万叶集》为代表的日本古典诗歌的研究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并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中西进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就是两位学者合作交流的结晶。中西进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日本古代文学研究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并以《万叶集》研究为中心,先后发表了《万叶集比较文学研究》《万叶史的研究》《万叶和大洋彼岸》等颇具分量的代表作,是日本“中西万叶学”的缔造者。王晓平先生在潜心研究《诗经》期间对《万叶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0年12月起,王先生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客座副教授,正式开始与中西进先生展开学术探讨。“对谈”是日本学界非常推崇的一种交流方式,学者们无须正襟危坐,而是非常诚恳、直接、愉悦地交流,告别闭锁的态度,彼此欣赏对方文化的精髓,这样的对谈成果不仅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而且浅显流畅,非常能够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通过对9世纪以前(中国的唐代,日本的上代)诗歌中各种自然物意象的比较,来探寻中日诗歌独特的韵味。意象是诗

歌审美体验的凝聚,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美学观念,王晓平先生深入而具体地讲述了导致中日两国诗歌差异的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意象是自然与生活的结晶,更鲜明地表现出民族的个性。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发达的史官文化与巫文化交融构成的古老传统,改朝换代,多族共存,治乱更迭的社会现实,以及诗人的文官身份,四季交替,面貌多异、寒暑屡变的自然环境等,都赋予中国诗歌意象丰富而沉重的负载。相比之下,自古延续的天皇统治,武士在政权中的稳定作用,长期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传统文化的多重思想文化结构,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山紫水明、多雨多山的自然环境,以及歌人的后宫贵族妇女、僧侣、政治圈外的文士这种身份等,使得日本和歌的意象负载要轻松、单纯、明朗得多。”^①

2010年,王晓平先生获颁日本第二届“奈良万叶世界奖”。颁奖委员会认为,自1981年发表《〈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以来,王晓平先生成为中国《万叶集》研究的先驱者,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根基,致力于以《万叶集》为核心的中日古代诗歌的比较研究,向中国读者传达了日本古典和歌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沟通是双向的互动。2008年,王晓平教授推出带有学术随笔性质的《日本中国学述闻》,从异域视角向我们展现了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如何言说中国,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学界有何不同。的确,在汉学或者中国学兴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有与世界对话的强烈愿望,但对话不等于自说自话,“对于对象国的文化缺乏足够的知识准备,那么也就很难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很难从对话中吸取什么”^②。真正理解邻国的思想文化,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既要有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又必须克服种种带有先入之见的文化观,学会超越偏见和误解。

《日本中国学述闻》语言清新流畅,将深刻的学理以轻松的随笔风娓娓道来,极大地拉近了象牙塔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正如柴剑虹先生在《趣博旨约,识高议平——〈日本中国学述闻〉读后感言》中所做的评价:“读了他的《述闻》,则使我想起了早年王国维先生评述沈曾植的十个字——‘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这也正是王先生的写作初衷:“孤诣独往,而不孤芳自赏;学归大众,决不哗众取宠。是以为戒。”^③在累计10余年的旅日生涯中,同日本的导师、同事、学生、社会人士对话,已经成为王先生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担任日本帝塚山大学专职教授期间,王先生曾与鹤崎裕雄教授合上两门课程,分别为“日中比较文学”和“日本地域文化”,

① 王晓平:《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页。

② 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页。

③ 同上,第484页。

一人主讲,另外一人即兴发言或点评,有时还带领学生参观寺庙或博物馆等,探讨式的学习方式很受学生欢迎,而这也正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跨文化”对话。

王晓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日本中国学文萃”,选择的也大都是这类文化“大家”学归大众的“小书”,如池田温的《敦煌文书的世界》、中西进的《万叶集与中国文化》、加藤周一的《21世纪与中国文化》、后藤昭雄的《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等,选取这些著作,或侧重于其保留中国古代文献的价值,或侧重于其对本土研究的拾遗补阙,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重要影响等,总之,做到了雅俗共赏,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能够促进中日双方的研究者乃至大众做到“知己知彼”,正如王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惊鸿一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深知熟稔。”

三、日藏汉籍古写本的文献学研究:文化密码的追寻与破解

王晓平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汉文古写本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目前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并于2015年2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了开题论证会暨首届汉文写本研究学术论坛。王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日本汉文古写本研究,是当下中日文化研究前沿可以直接展开对话的领域,更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有文明胎记的远古时期到当下信息时代,汉字是传播中华五千年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载体与视觉符号,承载的是华夏民族长久持恒的精神追求与探寻,通过汉字写本的传播,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展开了绵长而有效的对话。汉字古写本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文学、艺术和历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将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学术对话机会。从日本汉文古写本着手,考察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对于我们认识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当代国人振奋民族士气,有重要价值。”

汉文古写本包括两大类,一是周边国家现存的中国典籍写本,一是异国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写本。前者多是中国境内已散佚的宝贵文献,后者是中国文化影响周边各国文化的直接见证。日本现存古代汉籍写本的数量仅次于敦煌石窟,其中很多写本面临损毁失传的危机,因此收集与整理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这与中国文化历史贡献的国际评价息息相关,也是一代研究者的使命,王晓平先生呼吁:“写本一

失,永无补救,其唯一性与学术价值为学界所公认,对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域外汉籍写本的整理,不仅具有抢救我国文献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古籍校勘与拓展域外汉字及汉字文化研究也多裨益;由于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在周边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也具有推动作用。”^①

王晓平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写本的收集和整理。首先,摸清了日本现存古写本书写年代、书写者、保存地点、文献价值等基本情况,并搜集到绝大多数写本的影印本、影录本、摹录本、翻刻本、电子版等多种版本。其次,厘清了敦煌写卷与日本古写本的源流关系,并利用敦煌研究成果解决了一批日本古写本研究的疑难问题,特别是对日本古写本省代号与省代字的研究,为正确释录写本文献提供了依据。再次,由写本综观东亚汉字系统,将朝鲜汉文小说文字系统分为内汉字族、近缘汉字族、仿汉字族、非汉字符号族逐一分析,其方法大体适用于日本古写本。最后,对日本汉文古写本的文献价值给予了科学客观的评价。

王先生立足于写本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诗经》研究和敦煌文学研究,两者相互交织、相互印证。例如,将敦煌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日藏古写本的考证,来科学考证中古《诗经》在日本的流传与变异轨迹。许建平在《敦煌〈诗经〉写卷研究综述》中,就特别提到王晓平教授的日本古写本研究“将敦煌本与静嘉堂文库所藏《毛诗郑笺》本的旁注异文比较互证,以抉发两者之价值”,并指出:“将写卷与日本古抄本互证,以探寻中古时期《诗经》文本流传之脉络,考察《诗经》异文之演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王先生的研究成果也备受日本学界关注,例如对日本古抄本《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的研究论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奈良女子大学研究班的注意,并在其新著《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中被多处引述。

(一)《诗经》日藏古写本的文献学研究

《诗经》流传到日本后,对日本文学、思想、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被王晓平先生概括为“诗经现象”。王老师指出,对于散落于日本的《诗经》因子的“文化钩沉”,有助于解释中日文化固有的联系,而且,日本学者对《诗经》的改写和翻译,突出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和为汉、和汉并存”的特点,可称之为《诗经》的“异文化变奏”。从写本的文献学意义来说,日本现存多种《诗经》古写本,与敦煌所藏《诗经》写本可以相互对照考校,更加有利于凸显两国写本的文献学价值。

王老师对《诗经》的研究起步于1978年攻读研究生的阶段,在长达30多年的

^①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56页。

赴日访学及执教期间一直致力于《诗经》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与《诗经》结下了深厚的、割舍不断的“地缘”“人缘”与“书缘”。王先生发表了《〈诗经〉的异文化变奏——〈国阙周诗〉〈诗经国风〉及其他》《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论日本古代的“诗经现象”》《日本现存诗经古写本与当代诗经学》等多篇学术论文,并于近年先后推出专著《日本诗经学史》和《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在我国《诗经》文献学及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为域外《诗经》写本文献的整理与抢救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诗经学史》是首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海外《诗经》学术通史,厘清了保存在日本的《诗经》写本和印本文献系统,从跨文化的立场研究日本对《诗经》写本的解读,考察其独特视角及变形,并深挖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及文化传承等因素。王先生这样评价日本《诗经》学史的研究意义:“今天的《诗经》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突显中国文学源头的鲜明个性,也是为了让《诗经》体现的世界诗学的共性更为清晰。……只有充分理解日本《诗经》学发展的语境,才会摆脱单纯‘借鉴’的思路,给异国的学术成果以恰当、合理的评价。”^①

《日本诗经学史》一经问世便获得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刊登的《2009年经学报告》中指出:“值得一提的是,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填补了日本《诗经》学引介与研究的空白……《日本诗经学史》详细地梳理了《诗经》在日本被翻译、传播的过程,对一些著名《诗经》注本,如竹添光鸿所著《毛诗会笺》的介绍,皆颇有见地。”此外,石祥的《学术本位 文化观照——评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蔡育儒的《异域绽放的琼葩——王晓平教授〈日本诗经学史〉述评》、刘九令的《中华经典 世界共享——评王晓平教授〈日本诗经学史〉》、张小敏的《读〈日本诗经学史〉》等均肯定《日本诗经学史》“学术本位、文化观照”的鲜明特点和突出贡献。

2012年,王晓平教授继续推出《诗经》的文献学专著《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详尽介绍了《诗经》日藏写本的研究状况、日藏中国《诗经》著述佚文考、日藏《诗经》写本与敦煌、《毛诗正义》单疏本和静嘉堂本《毛诗郑笺》、江户时代的《诗经》文献考、《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的《诗经》文献,王晓平先生在前言中说:“本书旨在科学描述日本所藏《诗经》古写本和印本的基本情况,对保存在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加以梳理,利用写本研究的宝贵积累,特别是敦煌写本研究对中古语言文字研究的新收获,对其中的唐钞本和日本钞本加以释录,以期客观地确认这些资料的价值。”^②总之,该著作在《诗经》域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日藏《诗经》钞本

① 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页。